

## 他者眼中的盛世：從朝鮮燕行紀錄

### 談乾隆晚年之文人處境（1777—1790）\*

陳雨若\*\*

#### 摘要

《燕行錄》為朝鮮文人紀錄因出使至中國所見所聞之作品，從朝鮮立國以來至清末約 500 年間，朝鮮國王定期派出使節團前往中國進行各項交流，隨團的文人回國後所撰之《燕行錄》，無疑是窺伺當時中國的第一手資料。又因其長年往復、絡繹不絕，從《燕行錄》的記載中，更可以看出中國歷時性的變化。

因此，本文嘗試以乾隆晚年 1777—1790 年間的各項燕行紀錄為材料，以朝鮮文人對中國人的觀察作為核心，探析盛世下文人的生活樣態與處境。另外，乾隆晚年也是整個清朝極具關鍵的時期，此後大清帝國開始由盛轉衰。透過朝鮮文人的記錄，從他者之眼捕捉盛世下的鬆動與衰敗。

**關鍵詞：**東亞漢學、燕行錄、乾隆晚年、朝鮮、中朝文人

---

\* 本文原題〈帝國盛世的鬆動與衰敗：從《熱河日記》的「筆談」看乾隆晚年的文人處境〉，為林桂如教授開設「明清遊歷書寫專題研究」課堂報告，經修改後投稿，初稿宣讀於 112 年 11 月 4 日「2023 道南論衡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寫作過程承蒙林桂如教授、講評人洪國恩先生，及多位匿名審查人諸多寶貴建議，後將題目修改為〈他者眼中的盛世：從朝鮮燕行紀錄談乾隆晚年之文人處境（1777-1790）〉。感謝諸位先生惠賜卓見，使拙作更佳完善，謹致謝忱。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學生。



## 一、前言：乾隆晚期燕行紀錄說明

朝鮮王朝（1392—1910）自立國後，便長年派遣使臣前往北京進行朝貢或是旅行要務，古時出入國境並不普遍，出使北京可謂難得大事，所以不少使臣或是使行團成員在歸國後，都會將所見所聞撰寫為紀錄。這些紀錄記載了當時中、朝兩國的文化交流，流傳至今，成為中、朝研究的重要文獻。這類起因於行使而留下來的私人紀錄，學界多以《燕行錄》作為總稱，不過朝鮮文人在華紀錄以及其出使的職稱會隨其出使的目的和朝代的更迭，而有所不同。<sup>1</sup>大體來說，在明朝出使的記行，多命名為《朝天錄》，清朝則多名為《燕行錄》，本文研究以乾隆朝晚年為主，因此以下論述，統以「燕行使」和《燕行錄》稱之。

夫馬進指出，「燕行使」是世界外交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一種十分特殊的現象，在約 500 年間，使節團基本上是沿著同一條道路，往返於漢城（今譯首爾）和北京。其根據《清選考》的記載統計，從朝鮮仁祖 15 年（明崇德 2 年，1637）至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朝鮮高宗 31 年（清光緒 20 年，1894）為止的 258 年之間，朝鮮共向清朝派遣了 494 次使節，平均每年派遣 2 次。<sup>2</sup>撇除後期《燕行錄》大量援引，甚至抄襲前人《燕行錄》論著，導致內容大多雷同外，<sup>3</sup>朝鮮使臣以及同團文人們所撰之《燕行錄》，無疑是對中國最為長期且穩定的觀察記錄。其中，朴趾源（1737—1805）的《熱河日記》更是眾多朝鮮文人燕行紀錄裡最廣為人知的作品。

而本文將目光聚焦在乾隆朝晚年，係據徐毅之分期，18 世紀是清朝、朝鮮文學學術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時期，尤其到 18 世紀中晚期（乾嘉時期），朝鮮文人與清朝中上層的文人交流頻繁，<sup>4</sup>而且多為名士，如紀昀（1724—1805）與洪良浩（1724—1802）兩人曾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時交換了許多意見。洪良浩當時以冬至兼謝恩正使的身份第二次出使，而紀昀時任禮部尚書，兩人一見如故下交誼甚密，後也長年通信交流。且洪良浩與紀昀在兩國文壇各享盛名，居於學術的領導地位，他們的交遊對兩國的學術交流有極其重要的意義。<sup>5</sup>

<sup>1</sup>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地 10 卷第 1 期（總第 19 期），（2013 年 6 月），頁 300。

<sup>2</sup> 〔日〕夫馬進著，伍耀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91。

<sup>3</sup>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第 4 卷第 5 期（1967 年），頁 42。

<sup>4</sup> 徐毅：《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7。

<sup>5</sup>

徐毅：〈傾蓋如故，同氣相求——洪良浩與紀昀交遊攷述〉，《열상고전연구》第 31 輯（2010 年），頁 436。

但為何著重於乾隆晚年的時間斷代？源是朴趾源前往中國的時間——乾隆 45 年（1780），既是乾隆朝晚年，也是清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年，引發筆者關注。如歐立德（Mark C. Elliott）所分析的，在 1776 年乾隆任命和珅（1750—1799）為軍機大臣後，乾隆盛世頻頻發生的叛亂和不斷接露出的官僚腐敗現象，使這個時期成為一個逐步異化和惡化的時期。<sup>6</sup>但是有關乾隆朝晚期的重大爭議：「乾隆朝晚期到底該被視為清朝盛世的最後幾年，還是應該被看作清朝衰敗的開端？」<sup>7</sup>朝代興衰這類判斷，及腐敗和墮落與否，牽涉諸多繁雜因素的問題，需要考量當時君主、官僚和社會文化菁英對待彼此的態度，及他們對傳統國家的既定目標與想法。

顯然，帝國問題很難歸結於某一原因，然而作為「他者之眼」的朝鮮文人所著之燕行紀錄可謂時間的切片，為當時清朝社會匆匆留下一張快照，向讀者展示部分的乾隆晚期臣民的樣態，透過文中紀錄進而瞭解帝國發展下的一面。本文以朴趾源到中國的乾隆 45 年做為中心，結合前述往前推了三年，又為看出歷時性，則往後十年至乾隆 55 年，此時乾隆已 80 歲高壽，此次朝鮮也派了祝壽使行團，是繼乾隆 45 年後又再次前往熱河。根據這段時間的燕行紀錄，試圖從不同視角觀看帝國盛世的文人處境，以及隱含其中的鬆動與衰敗。

據《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所附的〈中朝燕行紀錄〉，乾隆 42 年（1777）至乾隆 55 年（1790）共有 55 次燕行使團，這段期間產生不少《燕行錄》名作，本文參見《燕行錄全集》、《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sup>8</sup>擇選以下作品，作為主要分析文本：李德懋（1741—1793）《入燕紀》、朴趾源《熱河日記》、盧以漸（1720—1788）《隨槎錄》、洪良浩《燕雲紀行》及徐浩修（1736—1799）《燕行紀》，筆者按出使年的先後和順序，整理表格如下：

表一：本文所涉《燕行錄》出使年代表

出使年	作者	作品
乾隆四十三年（1778）	李德懋 （1741—1793）	《入燕紀》

<sup>6</sup> [美] 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青石譯：《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州皇帝》（新北：八旗文化，2015 年），頁 310。

<sup>7</sup> [美] 蓋博堅（R. Kent Guy）著，鄭云艷譯：《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頁 3。

<sup>8</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之《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從現存于韓國各大重要研究機構的燕行文獻中精選了 33 種，集錄韓國所藏之燕行錄漢文文獻珍本，時間上主要集中於 17 世紀。本文《燕行錄》文獻主要參考其輯錄之珍本，為行文方便，後面僅標註冊數與頁數。參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全 30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朴趾源 (1737—1805)	《熱河日記》
	盧以漸 (1720—1788)	《隨槎錄》
乾隆四十七年 (1782)	洪良浩 (1724—1802)	《燕雲紀行》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徐浩修 (1736—1799)	《燕行紀》 (《熱河紀遊》) <sup>9</sup>

李德懋（1741—1793）在 1778 年作為謝恩陳奏使團書狀官隨行成員前往北京，本次燕行，李德懋寫下以日記體形式《入燕記》，全書以敘述了此次使行途中每日經歷，記錄從出發當日開始，至返程途中跨過鴨綠江結束。<sup>10</sup>李德懋在行前大量閱讀前人所撰的《燕行錄》，尤其是金昌業（1658—1721）所撰《老稼齋燕行日記》。<sup>11</sup>李德懋是較早與清文人有大量文學、學術交流的朝鮮文人，<sup>12</sup>其所撰寫的《入燕記》篇幅雖短，提供很重要的文獻資料。

《熱河日記》為朴趾源在乾隆 45 年，時年 44 歲的他跟隨堂兄朴明源（1725—1790）率領的祝賀乾隆 70 大壽的訪華使團來到中國，回國之後撰寫而成。《熱河日記》寫成之後，逐漸在社會上流傳開來，並很快形成極大的影響，但其文體與表現形式飽受儒士批評，朝鮮正祖（1752—1800）曾批評：「近日文風之如此，原其本，則莫非朴某之罪也。」<sup>13</sup>認為他「文體卑下」。因此，同朴趾源的許多其他作品一樣，《熱河日記》長期以抄本在民間流傳，直到 1900 年才第一次公開刊行。之後陸續刊行了多種版本，中日韓學界開始關注此書從事介紹與研究。<sup>14</sup>《熱河日記》作為《燕行錄》的名篇，長年下來一是學者關注的焦點，直至近年，《熱河日記》文本有了多元且豐富的研究成果。<sup>15</sup>在創作與流傳的過程中，出現了諸多稿本、鈔本和刊本。從現有成果來看，學界多以新活字本《燕巖集》中所收錄

<sup>9</sup>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作「《熱河紀遊》」，參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24 冊。

<sup>10</sup> 李夢圓：〈朝鮮文學家李德懋作品所表現的中國文人素質——以《入燕記》為例〉，《濱州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2 期（2014 年 4 月），頁 107。

<sup>11</sup> 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 18 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上）〉，《韓國研究論叢》第 22 輯（2010 年 12 月），頁 62。

<sup>12</sup> 徐毅：《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9。

<sup>13</sup> 韓國古典翻譯院：《韓國古典綜合 DB》，朴趾源《燕巖集》卷之二〈答南直閣公轍書〉（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1932 年鉛活字刊本），頁 12 上。參見：<https://reurl.cc/mD7ZZj>，瀏覽日期：112 年 7 月 13 日。

<sup>14</sup> 楊雨蕾：〈韓國《熱河日記》研究綜述〉，《韓國研究》第 5 輯（2001 年），頁 139。

<sup>15</sup> 關於中國跟韓國《熱河日記》研究概況可參看張麗娜：《〈熱河日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年），頁 2-3。

的《熱河日記》為底本進行研究。<sup>16</sup>目前版本研究成果頗豐，版本系統皆有詳實的分析，不同版本的內容比勘也有學者撰寫專文。<sup>17</sup>本文將以 1997 年上海書店出版社所出版的朱瑞平點校本作為主要引註文本。<sup>18</sup>

與朴趾源同一年前往熱河的還有盧以漸，相較於《熱河日記》，盧以漸所撰之《隨槎錄》相較之下關注度較少，主要是內容上不如《熱河日記》詳實，早期整理出版時，也因為目錄編排的關係，使大多數學者並未注意其與《熱河日記》為同年的《燕行錄》文獻。<sup>19</sup>盧以漸仕途平淡，乾隆四十五年以上房裨將的身份參加謝恩兼進賀使團前往清朝，慶祝乾隆皇帝 70 大壽。盧以漸家族先祖曾於「壬辰倭亂」（日本稱為「文祿之役」）戰死，盧以漸深受影響，加上後來改朝換代為清朝，盧以漸遂產生了「尊明排清」的思想，<sup>20</sup>與帶有開放心態的朴趾源有較多的不同。由此，《隨槎錄》與《熱河日記》兩者可以相互參照，使對此次燕行的過程和結果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洪良浩於乾隆 47 年以禮曹判書的身份被任命為副使，同正使、書狀官帶領三節年貢兼謝恩使團赴京，洪良浩這年 51 歲，此次燕行他寫下了《燕雲紀行》，十二年後，乾隆 59 年（1794 年）71 歲的洪良浩以正使的身份出使，此行著有《燕雲續詠》。兩次燕行，洪良浩用大量的詩歌把所見與歷史融入其中，又其對音律、對仗之講究，讀來富有趣味，因真實呈現乾隆末年東北、華北地區，極具參考價值。<sup>21</sup>

徐浩修出身於朝鮮望族，包含徐浩修在內，一家三代皆為燕行官員。乾隆 55 年，徐浩修以副使的身份出使，到熱河慶祝乾隆皇帝 80 大壽，回國後撰寫《燕行紀》（《熱河紀遊》）一書，書中詳細記載乾隆 80 壽誕幾乎所有過程，此書也將《燕行錄》從早期單純記行，轉換至集實錄、考據、研究為一體之著作，是繼《熱河日記》後，《燕行錄》的另外的一個里程碑。<sup>22</sup>

需要注意的是，朝鮮前期作為明朝的藩屬國，從政治制度到思想理念，乃至

<sup>16</sup> 許放：〈國家圖書館藏《熱河日記》論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十七輯（2018 年），頁 265。

<sup>17</sup> 版本系統的整理可以參看註 3 許放一文，而韓東有針對手抄本收錄內容撰寫專文分析，指出手抄本相較於定本更貼近「真實」情況，定本則是朴趾源不斷修正與完善的內容，強調手抄本的研究價值。詳見韓東：〈論朴趾源《熱河日記》的創作技巧及其手抄本價值〉，《東疆學刊》第 33 卷第 4 期（2016 年 10 月），頁 31-37。

<sup>18</sup> 此點校本以 1932 年朝鮮大東印刷所出版的鉛印本《燕岩集·別集》之《熱河日記》為底本，並以臺北國家圖書館的影印本及 1968 年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出版發行的李家源先生句讀本為參校本。全書對龐雜的日記與雜錄內容進行了分類整合，共分五卷。校本的字體為繁體，是目前較為完整的點校版本，被相關研究廣泛引用。

<sup>19</sup> 王鑫磊：〈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隨槎錄》的史料價值——兼談朝鮮王朝的「小中華意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 期，頁 20。

<sup>20</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21 冊，頁 167。

<sup>21</sup> 弘華主編：《燕行錄全編》第三輯之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519-520。

<sup>22</sup> 弘華主編：《燕行錄全編》第三輯之四，頁 376-378。

日常生活中皆採取「慕華」之態度，明朝滅亡後，不禁對朝鮮帶來極大的打擊，原本視為「蠻夷」的滿洲人入主中原，也大大的衝擊朝鮮人的正統觀，<sup>23</sup>也更加深他們對於明朝的思念，所以朝鮮文人長期以來受「尊周思明」的華夷觀念影響，對於清朝難免有先入為主的判斷，<sup>24</sup>可至 18 世紀後期，中朝文人交往越發密切，也使其在部份記述上不同於前人紀錄上完全的文化鄙視，較為客觀的呈現清廷的政治、社會現狀，因此，本文將目光集中於「文人」身上，欲從乾隆晚期，使行至清朝的朝鮮文人所留下的燕行紀錄，探討在乾隆統治晚年不同階層士人生存樣態與處境。

## 二、掙扎生存壓力：「日記」揭露的底層文人

細讀文本就會發現，《燕行錄》中大多能夠詳細記錄所見所聞，且承前言，18 世紀後的朝鮮文人積極與中國士紳交流，從文中也可以得知燕行者們熟讀前人的燕行紀錄。

洪大容（1731—1783）於乾隆 31 年（1766）訪華而來到北京，他在此結識了進京趕考的「古杭三才」嚴誠、潘庭筠和陸飛，並與之進行筆談，數個月後返國，立即著手編了《乾淨衎會友錄》（內收錄《乾淨筆譚》）。<sup>25</sup>當時，朝鮮知識分子對於漢族受滿族征服、強制蓄辮髮，卻絲毫不加反抗而苟生的態度，內心相當輕蔑。因此，即使每年派遣到北京朝貢的使節團有三、五百人，兩國士人卻難以締結親密的友誼。<sup>26</sup>

與前人不同，洪大容著意與中國人交往，力求「會心人」，經由文字筆談彼此溝通，洪大容是第一個在北京廣交士人的朝鮮學者，<sup>27</sup>所以《乾淨同筆談》寫成後，很快在以漢城為中心的文人之間秘密傳閱，<sup>28</sup>對往後燕行文如李德懋、

<sup>23</sup> 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年），頁 54-55。

<sup>24</sup> 孫衛國指出朝鮮不管是「慕華」還是「尊周思明」，面對不認同的清朝，採取政治上的臣服，文化上貶視。見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頁 62。

<sup>25</sup> 夫馬進指出洪大容的燕行錄有兩種本，一種為抄本《乾淨筆譚》，另一種 1939 年出版活字本《乾淨同筆談》（此版本在 2010 年，上海高典出版社出版了標點本《乾淨同筆談》）。〔日〕夫馬進著，張雯譯：〈朝鮮洪大容《乾淨衎會友錄》與清代文人〉，《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5 期（2012 年），頁 94。

<sup>26</sup> 〔日〕夫馬進著，陳瑋芬譯：〈朝鮮奇書—關於洪大容《乾淨衎會友錄》、《乾淨筆譚》之若干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3 卷第 1 期（2013 年 3 月），頁 119。

<sup>27</sup> 張存武著、吳政緯編校：《清代中韓關係史論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頁 99。

<sup>28</sup> 〔日〕夫馬進著，張雯譯：〈朝鮮洪大容《乾淨衎會友錄》及其流變——兼及崇實大學校基督教博物館藏本介紹〉，《清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2013 年 11 月），頁 91。

朴趾源、朴齊家（1750—1805）具有示範作用，被稱為「北學派」<sup>29</sup>的思想啟蒙者。<sup>30</sup>朴趾源受《乾淨術會友錄》影響甚深，其應洪大容之邀為該書題寫了〈會友錄序〉，對洪大容燕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直到他的燕行，朝鮮民族才真正打破了自身在滿州人征服中國以後所設置的精神、文化上的鎖國狀態。<sup>31</sup>由此，這批 18 世紀後期初始的使節，或跟隨使團的朝鮮文人的紀錄，與前期相比，會有更多與中國文人交流的部分，也是本文裕加以探討之處。

同前述，朴趾源此次燕行正是處在清朝盛世極其關鍵的時刻，就其北學立場，欲從強盛的清朝帶回可學習借鑑之處。其在《熱河日記》中將筆談內容整理並獨立成篇，如跟商人交流的〈粟齋筆談〉、〈商樓筆談〉，以及在熱河期間大量與中國士人交流的筆談紀錄，如〈黃教問答〉、〈忘羊錄〉、〈鵲汀筆談〉等等。

朴趾源將沿路所見如可謂鉅細靡遺的記錄下來，舉凡對話前的動作，對話兼兩者的問答，皆詳細記之，如此詳實的交流紀錄，可以從中得到許多重要的資訊，透過記錄也反映在當時社會背景下文人的生活樣態，本節欲從燕行日記內容討論清朝的中下階層文人所面臨之社會問題。

首先從《熱河日記》卷五〈夕照寺〉的內容看起，文中記錄了當時閩地落第秀才的部分處境：

訪俞世琦於夕照寺。寺不甚宏傑，而精灑幽夙，真乃一塵不動，禪林中淨界，此為初見也。無一僧居住，皆閩越中落第秀才，無資不能歸，多留此中，相與著書刻板以資生。時居共三十一人，為人賃書，朝出未還。寂無一人。……俞君本閩人，為陝西兵備道陳庭學姊婿，今年二月喪妻，無子男，有四歲乳女，置婦家，身獨與小僮棲息此寺中。<sup>32</sup>

文中的俞世琦應也是落第秀才之一，他將幼女留置妻家，獨身與書僮上京趕考，落第後身無分文，只能靠教書維生，除俞世琦外，在夕照寺尚有近三十位秀才擁有相同處境。清朝科舉的競爭非常激烈，而仕紳階級的社會流動率也很高，<sup>33</sup>地方菁英作為家庭教師或是私塾老師，長久以來這一直是沒有求得一官半職者

<sup>29</sup> 進入朝鮮後期，在重視義理和名分的性理學，逐漸失去作為「指導思想」的情況下，學者洪大容、朴趾源、朴齊家等人提倡「利用厚生」，即指出具體的民生痛苦和現實問題，並提出了解決之道的實學思想，這派學者被稱為「北學派」。相關論述參見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5 年），頁 127-150。

<sup>30</sup> 衣若芬：〈睹畫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故宮學術季刊》第 33 卷 2 期，（2015 年），頁 57-58。

<sup>31</sup> 〔日〕夫馬進著，伍耀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頁 160-161。

<sup>32</sup> 〔朝鮮〕朴趾原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蝨葉記·夕照寺》，頁 347。

<sup>33</sup> 〔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著，廖彥博譯：《大清帝國的衰亡》（臺北：時報文化，2022 年），頁 57。

獲得收入以維持生計的一條路，朴趾源在途中與村里秀才富先生的談話，也提供了相關訊息。引發朴趾源好奇進而想與富先生交談，是因為他聽聞村人說有一位懂滿文的教書先生：

余問店主：「此村裏可有秀才塾師嗎？」店主曰：「村僻少去處，那有學究先生？去年秋間，偶有一個秀才，從稅官京裡來的，一路上染得暑痢，落留此間。多賴此處人一力調治，經冬徂春，快得痊可。那先生文章出世，兼得會寫滿州（洲）字，情願暫住此間，開了一兩年覺堂，教授些此邨小孩們，以酬救療大恩。現今坐在了關聖廟堂裡。」余曰：「可得主人暫勞導？」店主曰：「不必仰人指導。」舉手指之曰：「這個屋頭出首的大廟堂是也。」余問：「這個先生姓甚名誰？」店主曰：「一村坊都叫他富先生。」<sup>34</sup>

可知富先生是位秀才，他得了暑痢暫留村中，懂滿文、能文章，已經在村內開了一兩年學堂。朴趾源尋著店主提供的線索，果然見著了富先生，而富先生也成為朴趾源第一個有較長筆談紀錄的讀書人：

富曰：「願聞尊姓大名。」余書示之。富自書其名曰富圖三格，號曰松齋，字曰德齋。余問：「甚麼三格？」富曰：「是吾姓名也。」余問：「貴鄉華貫在何地方？」富曰：「俺滿洲鑲藍旗人。」富問：「你老此去，當面駕麼？」余曰：「甚麼話？」富曰：「萬歲爺要當接見你們。」余曰：「皇上萬一接見時，吾當保奏你老，得添微祿麼。」富曰：「倘得如此時，朴公大德，結草難報。」余曰：「吾阻水留此已數日，真此永日難消，你老豈有可觀書冊，為借數日否？」富曰：「無有。往在京裏時，舍親折公新開刻舖，起號鳴盛堂，其群書目錄適在橐中，如欲遣閒時，不難奉借。但願你老此刻，暫回携得真真的丸子。清心元（丸）、高麗扇子，揀得精好的作面幣，方見你老真誠結識，借這書目未晚也。」余察其容辭志意鄙悖庸陋，無足與語，不耐久坐，即辭起。富臨門揖送，且言：「貴邦明綢可得賣買麼？」

余不答而歸，正使問：「有何可觀？恐中暑。」余對：「俄逢一老學究，非但滿人，鄙陋無足語。」正使曰：「彼既有求，何可嗇一丸一箒耶？第不妨借看書目。」遂使時大送清心元（丸）一丸，魚頭扇一柄。時大即回，持掌大幾葉小冊而來，皆空紙所錄書目，盡是清人小品七十餘種。此不過

<sup>34</sup> 〔朝鮮〕朴趾原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渡江錄》，頁23。

數頁所錄，而要索厚價，其無恥甚矣。<sup>35</sup>

對話初始，富先生對朴趾源不愛搭理，自顧舂杵，當朴趾源喚其姓名時才面露喜色迎接。就跟許多朝鮮文人一樣，朴趾源抓緊機會跟中國知識人獲取書冊，期待能看到自己在朝鮮沒看過的書籍，結果反而被要求先交以清心丸與高麗扇。

清心丸是朝鮮的特產，官方製作的清心丸能救治不省人事、處於昏迷狀態的患者，在朝鮮國內被視為急救良方，朝鮮國王危機時刻，清心丸都成功化險為夷，<sup>36</sup>清心丸「活人緊要之藥」的印象深入人心。來往於北京、漢城的朝鮮燕行使，隨身攜帶的是官方調製的清心丸，是確保功效的稀有珍品，<sup>37</sup>朝鮮使節團多會攜帶清心丸在身上，以備不時之需。

以索要清心丸為最終目的的筆談在 18—19 世紀的燕行錄中時有記載，<sup>38</sup>朴趾源書中記錄多次中國人索要清心丸的事蹟，富先生只是其一。富先生索要清心丸的目的十分明顯，並將它作為與朴趾源交流的先決條件，朴趾源在對談後，發現「其容辭志意鄙悖庸陋」，不想再與之對談，甚至後與正使談論到此人，以「俄逢一老學究，非但滿人，鄙陋無足語。」評價，這句也反映出朴趾源對於滿人文化低落的成見。後來富先生如願獲得清心丸與扇子，依約給予書目，但是都是清人小品，並非重要的經典書籍，令朴趾源大批無恥。

由上述可推斷，富先生應是一位中下層的讀書人，能開私塾代表有一定的知識水平，但像朴趾源這般大族子弟看來，富先生應是粗鄙不堪，學識也不足以交流，按朴趾源的敘述，富先生明顯是位虛榮之士，未必為一人才，不能如願獲取功名，似乎也能料想，但透過朴趾源兩則不同秀才處境的記載，也向讀者展示部分中下層文士的生存樣態。

除了教書之外，中下階層的文人出路還有從商。在〈商樓筆談〉，李龜蒙講述從商的心情，也說了清朝士農工商、生員概況：

余曰：「中國四民雖各分業，卻無貴賤，婚嫁、仕宦，不相拘礙否？」東野曰：「我朝有禁，仕宦家不得與商工通婚，以清仕路，所以貴道賤利、崇本抑末。吾輩俱是家世做賣買的，未得士家為婚，雖納貲輸米，權補生員，亦不許鄉貢為舉人。」費生（費穉）曰：「此法只施於本貫，離鄉則未必然。」余曰：「一為諸生，則許以士類否？」李曰：「然。諸生亦有許多名目，有廩生、監生、貢生。以生員升補。一為生員，九族生輝，四隣

<sup>35</sup> [朝鮮] 朴趾原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渡江錄》，頁 24。

<sup>36</sup> 吳政緯：〈論朝鮮清心丸的流行與清代遼東社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62 期，（2019 年 12 月），頁 57。

<sup>37</sup> 吳政緯：〈論朝鮮清心丸的流行與清代遼東社會〉，頁 61。

<sup>38</sup> 陳俐、徐毅：〈清代中朝文士筆談原因論略〉，頁 133。

蒙害，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此乃生員之專門伎倆。士流亦有三等，上等仕而仰祿，中等就館聚徒，最下干求假貸。諺所謂做個求人面不成，生涯都絕，不得不做個假貸人，奔忙道路，不擇寒暑，向人囁嚅，情狀先露。不謂當年高談之士，化作世間可厭之人。諺所稱求人，不如求己，所以做賣買的，自無此惡況苦景也。」<sup>39</sup>

從李龜蒙所言的「我朝有禁，仕宦家不得與商工通婚，以清仕路。」即使買到生員也無法參與鄉試，考取舉人，進而扭轉身份的階級限制，呈現明顯的社會分級，但就費釋所言，顯然生員制度的亂象已是司空見慣，顧炎武〈生員論〉即提出生員不是為了功名本身，而是為了保護身家，透過關節而求得者多至十分之七八，此外還有武生、奉祀生之類，無不以金錢賄買而得。關節是朝廷嚴禁的，而保身家之情則先王所不能禁，<sup>40</sup>故像李龜蒙這樣有想法的儒商，寧可作買賣，也不願面對「惡況苦景」。

乾隆統治時期，中國無疑是個盛世，但是「盛世」在普通人眼中，究竟意味著什麼？孔飛力（Philip A. Kuhn）指出：「從一個 18 世紀中國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來看，商業的發展，大概並不意味著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會變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著在一個充滿競爭並十分擁擠的社會中，他的生存空間更小了。」<sup>41</sup>另外，帝國富裕強盛的背後，也伴隨著人口增長，尤其盛清時期，人口是快速增長，1700 年時清朝的人口約為一點五億，到 1750 年時人口超過兩億，1800 年時則已超過三億。<sup>42</sup>人口的快速增長，使下層功名的擁有者從 1400 年約 4 萬人，到 1700 年約 60 萬人，在 18 世紀的後半葉，朝廷雖謹慎地努力減緩科舉增額狀況，但在長期盛世中，國家的這種作法實際上只是使問題更嚴重。<sup>43</sup>末三行所言「生涯都絕，不得不做個假貸人」以及「所稱求人，不如求己，所以做賣買的，自無此惡況苦景也。」乍看之下為有理想的文士遠離不義，但若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李龜蒙商人的身份來看的話，便可以看到其背後所隱含的社會問題。

除了面臨競爭的生存空間，1780 年的中國社會正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大約在此年以後，通貨膨脹已不僅僅侷限於人們對之很敏感的稻米價格，而是擴張

<sup>39</sup> 〔朝鮮〕朴趾源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商樓筆談》，頁 48。

<sup>40</sup> 范金民：〈明後期江南生員群體形象——讀顧炎武〈生員論〉〉，《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1 期（2022 年 1 月），頁 105。

<sup>41</sup> 〔美〕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劉昶譯：《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臺北：時報出版社，2000 年），頁 50。

<sup>42</sup> 〔美〕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青石譯：《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州皇帝》，頁 277。

<sup>43</sup> 〔美〕羅威廉（William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 147-148。

到了所有商品上，<sup>44</sup>經濟發展擴大了城鄉差距，為了生存，人口持續流動，大多數的人如筆談中的這些商人，離鄉背井，去拚搏自己的事業。在〈粟齋筆談〉中，紀錄的地點「藝粟齋」為一古董鋪，田仕可作為古董鋪主人在朴趾源離開前給他〈古董錄〉作別，從此種種可見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據說當時在江南一帶的仕官社會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飪，押優伶，談骨董」。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宦、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sup>45</sup>〈古董錄〉也反映當時對古董、古玩的欣賞，以及當時的社會風氣。

經由本節分析，得知在民間的交流所反映清朝當時所隱含的社會問題，帝國政策、經濟影響庶民甚深，從文字背後可以窺見市井小民在動盪變化的盛世生存的掙扎。

### 三、腐化與局限性：「異域」眼中的政治官員

朝鮮燕行使們「每年都是在大致相同的時期」出使北京的，根據規定，燕行使在北京停留的時間為期 40 天。<sup>46</sup>而乾隆 45 年與乾隆 55 年兩次祝壽的使節團都是前往熱河，其路線相較於其他燕行團已不大相同。抵達熱河，也意味著到達權力核心，朴趾源在這裡見到乾隆皇帝、六皇子永瑤以及權臣和坤，更在五天之內積極與太學館內的大臣交流，留下豐沛的筆談資料，也是長期學者們關注的焦點，<sup>47</sup>筆者將在前人的基礎上，佐以當時的文化背景，作更深層的文化閱讀。

對於長期關心「中國」的朝鮮文人來說，會想方設法了解當時清廷的局勢，並加以分析、判斷，部分可見朝鮮文人的敏銳，如朴趾源點出清朝皇帝出巡熱河是為了壓制蒙古：

今吾察熱河之地勢，蓋天下之腦也。皇帝之迤北也，是無他，壓腦而坐，扼蒙古之咽喉而已矣。否者，蒙古已日出而搖遼東矣，遼東一搖，則天下之左臂斷矣。<sup>48</sup>

又，他在〈黃教問答〉的序言中，也對皇帝邀請西番（西藏）班禪來熱河的政治目的進行了推測：

<sup>44</sup> [美] 孔飛力 (Philip A. Kuhn) 著，陳兼、劉昶譯：《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頁 53。

<sup>45</sup> 張宏杰：《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頁 330。

<sup>46</sup> [日] 夫馬進著，伍耀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193。

<sup>47</sup> 就筆者蒐集以「《熱河日記》筆談」作為研究主題的專著，大抵上討論範疇並未超出李學堂在《『熱河日記』中の筆談에 관한 研究》裡所提出的框架。

<sup>48</sup> [朝鮮] 朴趾原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黃教問答》，頁 178。

皇帝年年駐蹕熱河，熱河乃長城外荒僻之地也，天子何苦而居此塞裔荒僻之地乎？名為避暑，而其實天子身自備邊，然則蒙古之強可知也。皇帝迎西番僧王為師，建黃金殿以居其王，天子何苦而為此非常僭侈之禮乎？名為待師，而其實囚之金殿之中，以祈一日之無事，然則西番之尤強於蒙古可知也。<sup>49</sup>

由上述兩條引文可以看出，朴趾源透析清朝為制衡部族間的勢力所做之政治操作，但是其論述還是以「儒教」視角出發，其並不認同皇帝有除「儒」以外的信仰，事實上，乾隆 22 年至 47 年（1757—1782）間，乾隆皇帝曾先後於紫禁城、圓明園、承德等地修造八座「六品佛樓」，體現了他對相關信仰的熱情投入。<sup>50</sup>

朝鮮文人對於班禪信仰的疑惑與不解，恰巧也產生了認知與評價的衝突，朝鮮君臣對清朝的評價多著眼於文化，而非典章制度。照理而言，具有「滿人」血統的清廷皇帝既被朝鮮士人認做「夷」，有儒家以外的思想是理所當然的，甚至漢人文化對於滿人而言還是經由後天養成。用「傳統儒家」來檢視皇帝的所作所為，透露其根深蒂固的儒家學術涵養，使其面對所有「國」、「君王」相關的議題，還是不自覺的忽略血統的不同，認為非儒家相關的活動，皆是政治權謀、手段，呈現判斷與認知上的衝突與矛盾。

不僅對清廷平衡內部政治勢力有所關心，對於皇室繼承人的感想也直言抒發其見解：

門外忽見左右辟易，肅然無譁，皆曰：「皇子來也！」有一人乘馬入闕，從騎皆下馬步隨，所謂皇六子永瑤也。面白而痘癍狼藉，鼻梁低小，頰輔甚廣，眼白而眶紋三圍，肩巨胸闊，體軀健壯而全乏貴氣。然而能文章，工書畫，方今四庫全書總裁官，輿望所屬云。

余嘗入姜女廟，見壁間坎置皇三子、皇五子詩。皇五子號藤琴居士，詩酸寒，筆又削弱，才則有之，乏皇王家富貴氣像。藤琴居士即戶部侍郎金簡之甥，簡乃祥明之從孫，祥明之祖，義州人也，入大國。祥明官禮部尚書，雍正時人。簡之女弟入宮為貴妃，有寵。乾隆屬意在第五子，而年前夭歿，今永瑤專寵。去年往西藏，迎班禪。其歿者詩意酸寒，其存者又乏貴氣。陛下家事未知如何。<sup>51</sup>

<sup>49</sup> 〔朝鮮〕朴趾原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黃教問答》，頁 165。

<sup>50</sup> 羅文華：〈清宮六品佛樓模式的形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4 期（總第 90 期）（2000 年），頁 64。

<sup>51</sup> 〔朝鮮〕朴趾原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太學留館錄》，頁 130。

對於皇子的容貌、才氣毫不留情的批評，但他確實也點出乾隆立儲的難處。皇五子永琪於 25 歲英年早逝，《諸王傳》形容其「體羸多病，特聰敏，工書，熟經史。」<sup>52</sup>乾隆確實曾屬意其為儲君。<sup>53</sup>然而，朴趾源不清楚地是永瑤早在乾隆 24 年（1759），出嗣給慎靖郡王允禧為孫，所以已經不在王儲之列。另外，五皇子生母並非金簡之妹淑嘉皇貴妃，而是愉貴妃珂里葉特氏。<sup>54</sup>雖對皇子係出哪位嬪妃的資訊有誤，卻也顯示出朝鮮文人對清朝政權的關心，於乾隆 55 年，同樣造訪熱河的徐浩修，也在其《熱河紀遊》卷三〈八月一日〉中紀錄遇見皇子們的場景：

宴退，到勤政殿門外，遇皇八子儀親王永璇。秀容長身，舉止閒雅，實非凡流也，各國使皆拱立道左，而一不顧視，緩步而過。皇子本十七，今存四，永璇及第十一成親王永璜，第十五嘉親王永琰，第十七貝勒永璘，皇孫十，皇曾孫二，皇玄孫一云。<sup>55</sup>

徐浩修如朴趾源先形容皇子的外貌，描寫儀親王永璇氣宇不凡，雖不似朴趾源篇幅長，且夾有許多個人評價，不過他們同樣都提到皇子存歿，可見朝鮮文人對於清朝皇儲的關注是長期且不斷的。

乾隆朝晚年少不了權臣和珅，和珅在多部乾隆晚年所著的《燕行錄》頻繁登場，而實際上他也是影響清朝盛衰的關鍵人物，以下將以和珅為例，列舉多條有關其記錄，看看朝鮮文人眼中的「權臣」。首先，必須先了解這位把握乾隆朝晚期的權臣，最早是如何進入朝鮮文人的燕行紀錄裡的。筆者使用由韓國成均館大學建置的《燕行錄 DB》資料庫，以「和珅」為關鍵字搜索，得出最早的紀錄為乾隆 42 年（1777）李坤《燕行記事》裡的記載，當時的和珅已是皇上身邊的寵臣：

聞今戶部侍郎和珅，年纔二十餘，而初在扈輦軍矣。乾隆動駕時，見其貌、聽其言而甚愛之，歸后特召試策而賜科，一歲中超至侍郎，而乾隆去年又賜銀萬兩，為造其家云。凡官方不以履歷為準，亦不以卑微為嫌，雖下賤

<sup>52</sup> [清]《諸王傳 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檔案檢索系統」（文獻編號：故傳 007969），頁 10，參見：<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瀏覽日期：2023 年 6 月 8 日。

<sup>53</sup> 乾隆四十八年《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其時朕視皇五子於諸子中更覺貴重，且漢文、滿洲、蒙古語；馬、步射及算法等事，並皆嫻習，頗屬意于彼，而未明言，及復因病旋逝。」參王雲五選：《四庫全書珍本五集·欽定古今儲貳今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年），葉三下。

<sup>54</sup> [清]《后妃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檔案檢索系統」（文獻編號：故傳 007939），頁 20，參見：<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瀏覽日期：2024 年 3 月 10 日。

<sup>55</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24 冊，頁 260。

之類，有才華則用之，且多財者行賂而得官，凡諸差擬，貨賂公行，甚至於分窠定價，作一冊子，以爲賣官之式云，其仕路之澆雜可知矣。<sup>56</sup>

朝鮮使臣自渡過鴨綠江後，就開始了情報的搜集工作。除了肉眼所見、親耳所聽外，在路途旅店，逢人便問，遇事即記；到北京後，更是四出打探。他們得到情報的方式，有三種：一是直接抄錄從朝廷發佈的塘報和其他公文等；二是向序班及其他人員私下購買有價值的公私文件；三是通過在途或沿路與官員、士大夫的筆談，瞭解所需要的信息。<sup>57</sup>關於清廷政權所有的訊息，自然是使團文人關注的焦點，據李垕的紀錄，得知關於和珅的消息是「聞」，推測應是其遇到的中國官員告訴他的，從李垕的紀錄中看來，和珅此時已經是皇帝跟前的大紅人，深獲乾隆信任，而李垕把和珅快速晉升與行賄買官並陳，並暗示其身份低微卻以不正當手段迅速上位，如此說詞，可能受到與之對談的中國人影響。兩國士大夫主要交流的形式為「筆談」，透過筆談，兩國文人會交流各式各樣的資訊，甚至因而成爲至交好友。關於「筆談」，筆者將於下節做更深入的分析。

關於和珅出身，相較於同僚阿桂（1717—1797）、福康安（1754—1796）、福隆安（1746—1784）、董誥（1740—1818）、李侍堯（？—1788）等人出身是低，但是還是八旗出身，且和珅祖先立有軍功，授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多數人以其曾任鑾儀衛拜唐阿（即「執事人」），認爲其出身低微、卑賤，<sup>58</sup>事實上不然。在此，必須回到朝鮮文人如何看待得來的資訊與判讀訊息，他們的見聞並不全錯，通常是基於部分的事實，進而引申己見，<sup>59</sup>和珅的記載也有類似的傾向，如李垕之後朴趾源的紀錄：

晶頂者，乃戶部尚書和珅也。眉目明秀，俊峭輕銳，而但少德器，年方三十一云。珅本起自鑾儀司衛卒，性狡黠，善迎合，五六年間驟貴，統領九門提督，與兵部尚書福隆安常侍左右，貴振朝廷。<sup>60</sup>

引文反應和珅當時權集一身，如日中天的形象。朴趾源在文中不僅對於和珅的外型加以描繪，更對其晉升之路做扼要的說明，對其德行雖帶有「少德器」、「性狡黠，善迎合」等主觀判斷，若對照李垕的紀錄來看，對其能身處高位批判意味更

<sup>56</sup> 〔朝鮮〕李垕《燕行記事》〈宗人府〉，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燕行錄 DB》，參見：<https://kcer.skku.edu/>，瀏覽日期：2024年3月10日。

<sup>57</sup> 漆永祥：〈論「燕行錄」創作編纂過程與史料真偽諸問題〉，《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3輯（2019年），頁21。

<sup>58</sup> 馮佐哲：《和珅評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頁24-27。

<sup>59</sup> 吳政緯：〈論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價值——以清書、清語與滿漢關係爲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7卷第1期（總第33期）（2020年6月），頁74。

<sup>60</sup> 〔朝鮮〕朴趾原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太學留館錄》，頁140。

為強烈。同行的盧以漸亦紀載了和珅，對其外貌、升官之路帶有輕蔑的意味，直言「和珅者，以滿州鸞輿衛，為乾隆所愛幸……顏貌媚嫵如婦人，乾隆之寵愛有以也。」<sup>61</sup>，從李坤、朴趾源、盧以漸三者形容來看，和珅外貌應相當出眾，這也造成更多流言蜚語，如此流言也在外交場合發散，被朝鮮文人們記載了下來。

此行的書狀官趙鼎鎮（1732—1792）在其呈給朝鮮國王的〈進聞見事件〉中陳述類似的內容。書狀官是朝鮮外交使節團的三使（正使、副使、書狀官）之一，主要負責在參訪期間搜集各種外交情報，並監察使節團是否有不正之風，其在出使期間所搜集的各種外交情報，回國後會以文件的形式提交，稱為「聞見事件」。<sup>62</sup>趙鼎鎮在此次上呈的〈進聞見事件〉裡，針對和珅為人與其上位的描寫更加直白，內容也更加精細：

和珅，滿洲人，屬鑾儀衛，不次陞擢，寵幸無比。為人狡黠，善於逢迎，年方三十一，為戶部尚書九門提督，而以最所鍾愛之六歲皇女，定婚於其子。性又陰毒，少有嫌隙，必致中傷，人皆側目。原任閣老李侍堯、李如栢之後孫，而為皇帝所信任。年老位高，平日兒畜和珅，珅銜之。

年前侍堯為雲貴總督，而貴州按察使海明，為瀋陽奉天府尹，入京謝恩，歷辭和珅，珅私問侍堯動靜，海明言：「侍堯貪濁無厭，畏其誚責，嘗賂黃金二百兩，為壽於生日。」珅乘間奏之。仍請按驗執贓累萬，力請斬之。皇帝命囚刑部，籍其家貲。有黃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堯進貢物件，而還給者也。蓋藩鎮貢獻，有九種物，則每以三種還給。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於進貢，故皇帝心欲宥之，而重違珅意，詔諭各省總督及州縣官，議其置法當否，以海明之賂金，亦令充軍於黑龍江。

侍堯之貪，雖合置法，和珅之奏，亦出私嫌。及其按查，務從深刻，故人皆不直之，畏其勢不敢為傅生之論。<sup>63</sup>

朝鮮國王在看完書狀官所呈之「聞見事件」後，會與朝臣討論外交政策，為朝鮮掌握對外信息的正式文件，往後對外關係有需要時皆會拿出來參考，甚至會成為評斷的基準，<sup>64</sup>所以書狀官的紀載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他如何採取、撰寫所收

<sup>61</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21 冊，頁 293。

<sup>62</sup>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辭典》，參見：<https://encykorea.aks.ac.kr/>，瀏覽日期：2023 年 11 月 27 日。

<sup>63</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參見：<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eb?FAQiiMhp1>，瀏覽日期：2023 年 7 月 13 日。

<sup>64</sup> 同註 43。

集來的外交情報，會深深影響朝鮮的對外政策與態度。

藉由上述兩段引文，可知乾隆 45 年這次的使節團對於和珅的認識應該有著相似的資訊來源，以致他們對於和珅的紀錄並無太大差異，朴趾源在後面也略提了「侍堯之貪」，只不過不如趙鼎鎮詳細，使節團不同成員的紀錄，不僅展現他們對於當時清朝政局的認識，也讓讀者對於外交場合上資訊交換有了更多的想像。

到了乾隆朝統治的後半期，官員貪污這一嚴重問題再次出現，每隔幾年就會爆出一些重大案件。朴趾源來到中國的 1780 年，內閣大學士尹狀圖奏稱多數省分的財政收入都被政府官員無恥侵佔，卻遭到乾隆的嚴厲斥責。同年，雲貴總督李侍堯被人揭發貪贓枉法，乾隆命御前大臣和珅調查此案，和珅奏稱李侍堯的部下幾乎涉案，全省帳目需要仔細複查，即是引文中所述的「侍堯之貪」事件。事後，也如趙鼎鎮紀載「珅乘間奏之。……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於進貢，故皇帝心欲宥之，而重違珅意，詔諭各省摠督及州縣官，議其置法當否，以海明之賂金，亦令充軍於黑龍江。」事後，許多官員被隔去官職，李侍堯貪贓的重罪足以被判死刑，但是乾隆卻在和珅的建議下赦免李侍堯，並恢復其總督職位。乾隆的寬赦，讓貪腐越演越烈。<sup>65</sup>

不過，相較於前人對於和珅是較負面的評價，徐浩修的紀錄為我們提供較不一樣面向的和珅。1790 年乾隆 80 大壽的時候由和珅操持，和珅可以說是在每個環節親力親為，如八月一日紀載「軍器大臣和珅，領欽賜各種頒于參宴諸臣。余與正使，各蘋果一櫟，普洱茶一壺，茶膏一匣，書狀官蘋果一櫟，普洱茶一壺。」<sup>66</sup>又八月四日紀載「和珅之頒賞，必手自點檢，口呼名授之。」<sup>67</sup>而各國使臣拜見時，和珅也會在皇帝身旁指認，提醒乾隆現在是哪國的大使，如若細心，能獲得皇帝歡心也得以想見。徐浩修此行初始身份為副使，是可以與乾隆皇帝、和珅有直接互動的人，徐浩修也在其紀遊裡紀錄和珅與他的對話，他對於和珅的觀察相較於前面紀錄的遠觀聽聞，更為直接，徐浩修紀錄和珅勤快、能幹的一面，反應皇帝對其信任與寵信。

本文就《燕行錄》材料分析乾隆晚期的政治樣態，不管是政局相互牽制，還是皇子、寵臣，都是朝鮮文人會加以記錄、關心的，這些皆是重要的外交情報。和珅作為清代著名的寵臣，可謂是巧宦，獲得帝王的信任，得以讓死罪者免死，更位居要職，把持朝政，無人敢忤逆的狀態。必須注意的是，朝鮮文人雖認真蒐集資料，但是其侷限性在於資料來源可能單一，抑或是有資訊錯漏之處，加上燕

<sup>65</sup> 張宏杰：《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頁 290-291。

<sup>66</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21 冊，頁 259。

<sup>67</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21 冊，頁 270。

行文獻有「因襲前人」的特性，<sup>68</sup>判讀需格外謹慎留心。

#### 四、極權與文字獄：「筆談」潛藏的隱密書寫

燕行使雖然有譯官相隨，但這也限於高層參加正式儀式及會談，在大多數私下活動期間，絕大多數不諳漢語的燕行團成員，他們與中國人乃至其他外國使節的交流，主要依賴筆談。<sup>69</sup>中朝筆談主要見於《燕行錄》中，從整體上看，朝鮮文人對筆談稿的重視程度似乎要超過中方，大多數中國文人都把與朝鮮文人的筆談當作一次新鮮的異域文化體驗，雖在自己的詩文筆記雜著中有所記錄，卻並無編集談草的打算。而另一方面，朝鮮文人則積極地展開了筆談內容的記錄編集工作，為中朝筆談活動保留了豐富的文獻史料。<sup>70</sup>最早的整理可以追溯至 1930 年，日本中村榮孝編纂了《事大紀行目錄》。<sup>71</sup>在中朝筆談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較早的成果是日本學者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sup>72</sup>該書利用了大量第一手朝鮮燕行文獻（包含筆談文獻），將嘉慶、道光以下清朝學風對朝鮮影響作了細緻勾勒。21 世紀後，中朝筆談相關論著數量激增，形成了研究熱點。<sup>73</sup>然而筆談是如何形成的，在《乾淨衎會友錄》中有詳實地記載，其言：

其談也，各操紙筆疾書，彼此殆無停手。一日之間，不啻萬言。但其談草多為秋庫所藏，是以錄出者惟以見存之草。其無草而記得者十之一二。其廿六日歸時，秋庫應客在外，故收來者頗多，猶逸其三之一焉。且彼此惟以通話為急，故書之多雜亂無次。是以雖於其見存者，有問而無答者有之，有答而無問者有之，一語而沒頭沒尾者亦有之。是則其不可追記者棄之，其猶可記者，於三人之語，亦略以數字添補之。惟無奈其話法頓失本色，且多間現疊出，或斷或續。此則日久追記，徒憑話草，其勢不得不爾。吾輩之語，則平仲常患煩，故多刪之。余常患簡，故多添之。要以斡旋語勢，不失其本意而已。其無所妨焉，則務存其本文，亦可見其任真推誠，不暇

<sup>68</sup> 吳政緯指出現存燕行文獻數量龐大，鮮有通讀者，難以掌握史源和判斷是否抄襲。參吳政緯：〈論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價值——以清書、清語與滿漢關係為中心〉，頁 76。

<sup>69</sup> 王勇：〈朝鮮燕行使筆談文獻概述〉，收於王勇主編：《東亞的筆談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52。

<sup>70</sup> 潘建國：〈中朝文人筆談稿的形制及其流傳——以清劉大觀與朝鮮使者筆談稿手卷為例〉，《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0 卷第 3 期（2020 年 5 月），頁 155。

<sup>71</sup> 張伯偉：〈東亞文人筆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人文中國學報》第 22 期（2016 年），頁 308。

<sup>72</sup> 〔日〕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會，1975 年）。關於藤塚鄰博士《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以及其遺品，另可參見〔日〕金文京：〈十八、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在清朝的交流活動：介紹藤塚鄰博士遺品〉，《中正漢學研究》總第 18 期（2016 年 12 月），頁 81-96。

<sup>73</sup> 張伯偉：〈東亞文人筆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316。

文其辭也。<sup>74</sup>

由引文可見，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筆談的情況，非常顯然，筆談的紀錄是在筆談發生之後整理而成，從筆談當下到整理完的筆談文稿，往往是數月之後的事了，對於「還原筆談現場」其實是相當有限的。<sup>75</sup>由前述，清代前期與後期，朝鮮文士與清人筆談多是為了探查清朝政治或時事，以便回國後向朝鮮國王匯報，如韓國現存的古代外交文獻《同文彙考》中的「使行別單」，是朝鮮使臣歸國後將在清朝的見聞事件呈報國王的文本，其中載錄的詳實筆談記錄多達 20 種，這也側面反映探查清朝實況為筆談目的。<sup>76</sup>又如徐浩修與正使黃仁點（？—1802）結束出使任務回國復命，向正祖稟告時，正祖詢問清朝政令如何，黃仁點直言和珅權重的清朝政治實況，<sup>77</sup>徐浩修回應「和珅雖權重，而首閣老阿桂，清儉端雅，大系民望，皇帝又不替眷遇，故朝廷賴是維持云。」<sup>78</sup>便是向正祖分析清廷內部的權力結構，傳遞最新的國際情勢給正祖。

所以，燕行是莫大的文化工程，朝鮮使節們竭力蒐羅關於中國的知識，裝箱封存，運回朝鮮，向朝鮮輸入最新的中國。<sup>79</sup>以目前學界研究情況，實多重在清代的中朝交流，一方面清代的朝鮮使節較無館禁的限制，得以肆意遊觀，兩國文人交流更加方便；另一方面，清代的漢文文獻保存較為完整，資料相比明代更加豐富。<sup>80</sup>所以，本文也嘗試將目光放在這些「筆談」紀錄上，欲做不同面向之探討。

《燕行錄》筆談內容涉及中朝交流的諸多面向，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其中《熱河日記》的筆談獲學者大量討論，李學堂指出，筆談以及與筆談相關聯的部分佔了《熱河日記》全書的二分之一，認為朴趾源把筆談視為最能掌握清朝實情的方法，並盡可能地反映在作品中。<sup>81</sup>秉持著這樣的精神，朴趾源積極與大學館文人交流，這寫筆談也記錄了當時中國文人受文字獄的影響。

<sup>74</sup> [朝鮮]洪大容著，鄭健行點校：《清脾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34。

<sup>75</sup> 夫馬進針對洪大容寄予中國人的書信之重要內容在《乾淨筆譚》、《乾淨筆譚》中省略部分撰有專文。詳見夫馬進：〈一七六五年洪大容の燕行と一七六四年朝鮮通信使—兩者が體驗した中國・日本の「情」を中心に〉，頁148、167；中文版：頁164、182。

<sup>76</sup> 陳俐、徐毅：〈清代中朝文士筆談原因論略〉，《中國文學研究》2016年02期（2016年12月），頁131。

<sup>77</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24冊，頁493。

<sup>78</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24冊，頁493。

<sup>79</sup> 吳政緯：《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7年），頁28。

<sup>80</sup> 吳政緯：〈從中朝關係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以《燕行錄》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1期（2014年6月），頁213。

<sup>81</sup>

李學堂：〈燕巖의《熱河日記》筆談內容에 대한 일고찰〉，《亞洲文化研究》第15輯（2008年），頁179。

清朝是文字獄發展最嚴酷的朝代，乾隆時期達到頂峰，文人著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噤若寒蟬，一防己出言不遜以身犯禁，一防人無中生有借題發揮。在〈鵠汀筆談〉一章中，朴趾源題詩「不需人間費膏燭，雙懸日月照乾坤。」王鵠汀當即搖手示意，墨抹「雙懸日月」，日月同書即為明。<sup>82</sup>王鵠汀會如此緊張，很可能是因為在三年前，乾隆 42 年（1777）徐述夔事件影響，徐述夔《一柱樓詩》因有「明朝期振翻，一舉去清都」被視為「大逆」，徐述夔與其子雖已亡故，也開棺戮屍，梟首示眾。皇帝大怒的影響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消滅所有不安全文字，文人學士再也不敢吟風詠月，甚至不敢再寫日記，朝廷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就算有也會銷毀，免貽後患。<sup>83</sup>「不遺留任何資料」一旦成為文人們的習慣，則文獻就會難以存續。

乾隆對於思想掌控並非從「查辦禁書運動」或編纂《四庫全書》才開始，在此之前已經很嚴厲了，清代文人對朝廷的這種統制非常恐懼，這在《乾淨筆譚》中表現得很明顯。其實潘庭筠也非常想要表達自己對滿族統治的真正想法。但因為是筆談，寫下的文字會成為證據，所以他非常小心，採取的措施就是一旦寫到關於滿族問題就使用另外的紙張，而且寫完以後馬上放進嘴裡嚼碎吞下。<sup>84</sup>

在朴趾源之前來到中國的李德懋也記錄了類似的事件，《入燕記》五月初十內容記載，夜裡書狀官邀谷應泰（1620—1690）的五代孫來筆談，他們問起了有關《明史紀事本末》，其態度有些遲疑，後擲筆離席：

書狀又召主人筆談，此谷霖蒼應泰之五代孫也，問《明史紀事本末》，則頓感良久，乃曰：「先祖坐此書被禍，故毀板，不行於世。」蓋直書清事，為家僮所告。康熙二十九年，年七十坐死，登順治科，官至浙江提學。書狀屢請詳言其事，其人竟秘諱不言，擲筆而起。<sup>85</sup>

而在六月三日遇到的蘇州府秀才沈瀛也有毀壞談草的行為：

館之東牆外人家，即林姓人，富商也。兕角、象牙、貂鼠之皮、朝鮮之紙，充牣棟宇，又多玩好，居室奢麗，擬如王公。邀蘇州府秀才沈瀛，為塾師，瀛少年文雅，嘗與筆談，問蘇杭優劣，答曰：「江山勝槩，杭勝於蘇，閭閻繁麗，蘇勝於杭。」問婚喪禮，答曰：「婚禮喪禮，如今俱亡了，可勝

<sup>82</sup> 趙慶，姚曉娟：〈《熱河日記》所見乾隆時期文學整體風貌〉，《文學評論》2020 年第 34 期（2020 年），頁 16。

<sup>83</sup> 張宏杰：《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頁 261。

<sup>84</sup> 〔日〕夫馬進著，張雯譯：〈朝鮮洪大容《乾淨筆會友錄》與清代文人〉，頁 96。

<sup>85</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21 冊，頁 83-84。

浩歎。」因裂其所書紙，有畏忌之色。<sup>86</sup>

沈瀛會如此小心是有原因的，因為在李德懋住的使館西側就是翰林院庶常館，像沈瀛這類的新科秀才敏感話題不僅忌諱，還影響自身前途，自然是需要謹言慎行。

除了文人自我審查的主動銷毀，也有來自官方強制的嚴禁、徹查。與朴趾源對談中有一位文人尹嘉銓（1711—1781），就是乾隆朝有名文字獄案的當事者，其卒年為乾隆 46 年，在乾隆 70 大壽的隔年尹嘉銓就因為上奏內容踰矩，觸怒龍顏，不僅惹來殺身之禍，其著作也全數查禁，其父尹會一（1691—1748）的著作也遭受牽連，乾隆 46 年四月二十日通令各省將尹家著作的書籍、詩文、板片等解京銷毀，遭到禁毀的不僅是尹會一與尹嘉銓的著述，只要是尹會一或尹嘉銓所寫的序文、書信、刊字、石刻，甚至是在文章中提到兩人姓名，無論內文是否涉及違礙，一律皆在查禁範圍之內，足見乾隆對此事之震怒與不滿。<sup>87</sup>今存尹嘉銓的作品多為早期詩文，《熱河日記》可以說是詳實記載一位年邁的文人高談闊論思想、音樂等等制度，並開懷地與外國友人交心的樣態，成為描繪尹嘉銓晚年的重要紀錄。

除了跟「明朝」相關的議題是禁忌外，「禁書」也是一敏感的論題。朴趾源希望能如洪大容與其中國友人一樣成為「知己」，所以在筆談中也盡其所能地與中國文人談論各式各樣的議題，期間朴趾源記下多次抹去談草的現象，也跟王鵠汀談及「禁書」議題，盡可能問出實際情況，並對這現象做出如下總結：

蓋自以中國之遺民，常懷疾疢之憂，不勝嫌疑之戒。所以開口稱頌，舉筆諛佞，益見其自外於當世也，漢人之為心亦已苦矣。與人語，雖尋常酬答之事，語後即焚，不留片紙。此非但漢人如是。滿人為尤甚。<sup>88</sup>

經過其筆談資料蒐集，朴趾源對《四庫全書》所造成的思想禁錮給予直接的批評，認為清朝表面雖盛世，但背後隱藏文人風聲鶴唳的壓抑。可實際上，文字獄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包含相關聯「查辦禁書運動」）涉及非常複雜的問題，並非只是單一的思想禁錮、控制言論的目的與結果。

如今單就學術發展而言，《四庫全書》的編纂對於乾嘉學風有著深遠的影響，當時開館修書為一朝風尚，而入館修書亦可謂晉升的一大捷徑。知識分子的人館與未入館就猶如在朝在野，尤以四庫開館為甚。<sup>89</sup>如翁方綱，其學術交遊最為頻

<sup>86</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21 冊，頁 123-124。

<sup>87</sup> 劉易穎：《尹會一、尹嘉銓父子著述禁毀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 年），頁 32。

<sup>88</sup> 〔朝鮮〕朴趾原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黃教問答》，頁 165。

<sup>89</sup> 陳曉華：《〈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頁 197。

繁的時期是任職《四庫全書》纂修官期間，而參與《四庫全書》纂修對於其一生學術交遊也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來自全國各地的飽學之事雲集京師。在修書校勘之餘，他們常常一起聚會，或評騭書目，或宴飲賦詩，或品評金石碑帖，或交遊踏訪，可以說修纂《四庫全書》不僅促進了學術交流，而且直接推動了乾嘉時期樸學風氣的興盛。<sup>90</sup>再來，清人目錄學大大受到《四庫全書總目》影響，就考據群書，辨別真偽而論，雖不敢正面指摘《四庫全書總目》，皆在其基礎上，糾謬補誤。<sup>91</sup>可謂限制的同時，也刺激著新的發展。

雖說朴趾源、李德懋等屬對清廷統治的中國採取較開放心態的北學派，可明亡後，朝鮮人對於代表中華文化「上國」的明朝一直眷眷不捨，所以即使到康、雍、乾的清朝盛世，朝鮮士人對於清朝的認識除了前述歷史淵源外，又揉合長期以來思明、尊明的複雜情感，這些條件都使得朝鮮對於清廷的評估偏離實際情況，對於明、清兩朝產生截然不同的見解。<sup>92</sup>筆者認為，朴趾源其筆談紀錄對於中國記述的侷限性，除了前述所言其固有的學識思想外，還有出於其對於筆談的期待，既要如洪大容一般交心，可實際會面卻多有禁忌，以下為其對筆談問題本身的限制：

入他邦者曰我善覘敵，曰我善觀風，吾必不信矣。入人之國，安有執塗之人而遽有所詢訪哉？此一不可也，言語相殊，造次之間無以達辭，二不可也。中外既異，自有形迹之嫌，三不可也。語淺則無以得情，語深則恐觸忌諱，四不可也。問所不問，則跡涉窺偵，五不可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居其國之道也，況他國乎？問其大禁，然後敢入，居他國之道也，況大國乎？此其不可者六也，況其將相賢否、風俗淑慝、滿漢用舍、皇明故實，尤不可問。

非但此不可問，所不敢也；彼不宜答，亦所不敢也。至如錢穀甲兵山川形勝，似無甚關係，而非但此不宜言，彼必疑怪。何者？錢穀關虛實，甲兵係強弱，山川形勝有關阨險要之勢，此所以不宜問答也。

彼古人者常得之言語問答之外，如橋梁更鼓、執玉高卑有所占矣。如陳詩閱樂、市價貴賤有所徵矣。既無古人之識慧才智，而徒欲得之於毫墨立談之間者，其亦難矣，又況四海廣大，不見涯涘乎？<sup>93</sup>

<sup>90</sup> 劉仲華：《世變、士風與清代京籍士人學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50-351。

<sup>91</sup> 喬衍琯主編：《書目叢編·「書目叢編」輯印緣起》（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頁2。

<sup>92</sup>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頁80-84。

<sup>93</sup> 〔朝鮮〕朴趾原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黃教問答》，頁165。

朴趾源明確列出「不可問」的事項，即在筆談前，他就已經設定好談論框架，在有限的範圍內與人交談。實際上所謂的「交心者」，應是要雙方敞開心胸，毫無顧忌地談天，預設框架雖出自於朴趾源的體貼，但是實際上已經避開某些議題，用字遣詞也是盡量中庸、不淺不深，筆者認為這是在閱讀《熱河日記》筆談內容時必須要考量到的。

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兩國文人的交流也出現了轉向。如在朴趾源十年之後，於乾隆 55 年出使的徐浩修與紀昀對談，兩者大方地討論《四庫全書》針對《明史》與《大清一統志》的編寫，兩人更針對資訊呈現真偽有一番討論：

余問曰：「聞公奉勅校正《明史》、《大清一統志》云，已完工否？」紀曰：「《明史》中地名，人名之差舛者，事實之疏漏者，皆已訂補付劄，一統志則秩巨而訛謬尤多，必欲徹底校正，故尚未就緒爾。」余曰：「且以俺等今行所經地方言之，合懶甸，以《金史》、《麗史》參互，明是小邦咸鏡南道界，而《一統志》，以九連城傳會，古北口潮河川營，以亭林所記。證今之道里，潮河營，實在口外，而《一統志》計程，反在口內，恐非細失。」紀曰：「如此等誤，難以枚舉，蓋山經地志，多屬傳聞，及其足躡目覩，必不免相左爾。」余曰：「新校《明史》，可得見乎？」紀曰：「雖易付劄，姑未有頒行勅旨，待頒行，當以一部奉呈也，貴國鄭麟趾高麗史，極有體段，僕藏度一部矣。」余曰：「然則高麗史已翻刻於坊間乎？」紀曰：「即貴國板本也，貴國徐敬德《花潭集》，編入《四庫全書·別集類》。外國詩文集之編諸《四庫》，千載一人而已。」余曰：「所欲奉質者，非猝乍可盡，當於入京後，送人門屏請教，禁例所拘，無以躬進可恨。」紀曰：「弊廬在於正陽門外琉璃廠後。」<sup>94</sup>

從引文來看，兩人所進行的是純學術的交流，雖然如同前面來華的朝鮮文人一樣好奇明朝史實如何被輕人所接受，但相較於前人對於明亡濃烈的情感，接近執著地想要了解明朝在清朝裡留下多少身影，此刻更著重於知識、學識的討論，紀昀還主動提起《花潭集》被編入《四庫全書》，體現其欲交流的心。

由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在中朝文人在交流時，清朝文人面對敏感議題會有避而不答，抑或是銷毀談草的作為，但時間發展越後，兩方交流更偏重在學識上，而非意識形態上的差異。透過朝鮮文人的紀載，乾隆盛世統治下的極權與文字獄也展現出來了，也體現了當時文人的壓抑。

<sup>94</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24 冊，頁 243-245。

## 五、結語：帝國盛世的鬆動與衰敗

金文京認為，如同朝鮮通信使和日本文人、學者筆談記錄中呈現個人之間基於儒教、文學修養的平等友好的交流關係和國家觀的互相矛盾，清朝文人與朝鮮文人交流同時隱含著國家觀、民族觀的深刻矛盾。<sup>95</sup>作為文化交流，燕行的紀錄提供給我們觀看中國的不同視角，乾隆晚期且其恰巧處在時代的交叉點，為帝國命運更迭的過程提供線索。

李德懋在《入燕記》六月十三日中有以下紀載：

沿路告示有曰：皇上七月幸瀋陽，路傍田民，不可種靛。靛善聚蚊蠅，故禁之也。又有一榜，以為皇上幸行時，沿路市肆及廟堂毀壞者多，俱各及期完治，以作觀瞻之地云。余歎曰，此二者，非王者之政也，今中原衣尚青黑色，種靛為民生之大利，假使眾民或恐蚊蠅之集御輦，沿路千餘里，相戒不種靛，在上者敦諭，使之種之，以安其業，如今勒令不種，是稗政也。市肆之殘弊，係於民貧，廟堂淫祠也，自然毀落，不足為輕重於王政，如今使之修飭，取媚於皇帝，此州縣官之罪也。<sup>96</sup>

在 1778 年，地方官員就假皇帝巡幸之名妨礙民生，為了不要聚集蚊蟲，要百姓不要種植可以提煉青黑色染料的植物，使人民無以維生，更為了沿途風景美觀，要百姓修補廟堂、市肆，可謂勞民傷財。李德懋也直言批評這樣取媚於皇帝，是地方官員的罪過。由小見大，衰敗從細節處開始鬆動，進而影響整個盛世。

本文嘗試由 1777—1790 年間的《燕行錄》材料，以文人為核心，探析盛世下文人的生活樣態與處境。文人、知識份子，作為國家社會整體的運作，甚至是改革的推手，文人所思所想，乃至處境皆會影響國家，或是反應一個社會的現狀。而朝鮮使節與隨團的朝鮮文人，皆是兩班出身，受過非常嚴謹且良好的教育，他們良好的漢文能力使得他們可以用筆談與中國文人交流，兩國的知識份子帶著各自社會的縮影，在有限的時間內相互切磋，因為國情不同，更凸顯出兩者的差異。燕行使團年年往返同一條路徑，其沿路所見所聞的紀錄，以長遠時間來看，是一個非常穩定長期研究紀錄，可如前述，燕行文本有其特殊性與複雜性，文獻內容無法一一盡信，但有一定的代表性。

朝鮮文人用「他者之眼」紀錄中國的「不同」，為呈現燕行文獻中的文人樣態，本文先從中下層文士談起，就筆者分析，中下層文士明顯受帝國政策、經濟

<sup>95</sup> [日] 金文京：〈十八、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在清朝的交流活動：介紹藤塚鄰博士遺品〉，頁 92。

<sup>96</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21 冊，頁 148-149。

影響，並在其中奮力掙扎，反映乾隆朝晚年社會經濟的變動，階級晉升的不易，以及除了仕途之外，如何求生。而位居權力核心的上層政治官員，享有豐富的資源，卻頻繁出現貪腐之狀況，顯示清廷官員制度執行鬆散，且漏洞百出，而知識分子在乾隆晚年文字獄的壓迫下，言論有所壓抑，《四庫全書》的編纂亦帶來箝制思想的隱憂，呈現出乾隆晚年對於言論、書籍的嚴格控管。

另外，文人筆談雖是兩國知識分子直接交流，但礙於文字獄以及前述的「對話框架」，所以獲得的資訊還是有限的，並非代表全貌，也有部分訊息錯誤，但也為我們呈現了部分現狀，展示了帝國盛世下，已經從細微處開始破敗，如地方官員勞民傷財、貪腐，以及讓應被判死的官員免於處罰等等，制度一旦沒有上位者的堅持管控，就猶如脫韁野馬一般無法收拾，使帝國一步步走向衰敗。藉由朝鮮文人的燕行紀錄，我們得以從不同視角窺見帝國盛世下，所隱含的清朝文人處境，以及導致帝國衰敗的鬆動之徵。

## 徵引書目

### (一) 專書

- 〔朝鮮〕朴趾源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年。
- 〔朝鮮〕洪大容著，鄭健行點校：《清脾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王勇主編：《東亞的筆談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5 年。
- 弘華主編：《燕行錄全編》第三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吳政緯：《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7 年。
-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5 年。
- 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年。
- 徐毅：《十八世紀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全兩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 張存武著、吳政緯編校：《清代中韓關係史論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21 年。
- 張宏杰：《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新北：廣場出版，2015 年。
- 陳曉華：《《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 喬衍琯主編：《書目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全 30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
- 馮佐哲：《和珅評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 年。
- 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修訂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 劉仲華：《世變、士風與清代京籍士人學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日〕夫馬進著，伍耀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韓〕金明昊：《熱河日記研究》，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90 年。
- 〔美〕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劉昶譯：《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臺北：時英出版社，2000 年。
- 〔美〕蓋博堅（R. Kent Guy）著，鄭云艷譯：《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年。
- 〔美〕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青石譯：《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州皇帝》，新北：八旗文化，2015 年。

- 〔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著，廖彥博譯：《大清帝國的衰亡》，臺北：時報文化，2022年。
- 〔美〕羅威廉（William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 （二）期刊論文

- 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 18 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上）〉，《韓國研究論叢》第 22 輯，2010 年 12 月，頁 60-85。
- 王鑫磊：〈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隨槎錄》的史料價值——兼談朝鮮王朝的「小中華意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 期，2013 年，頁 19-29。
- 王鑫磊：〈朝鮮燕行使的蒙古族友人博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 1 期，頁 102-112。
- 朴香蘭：〈燕行錄所載筆談的文學形式研究——以洪大容與朴趾源為中心〉，《世界文學評論》2011 年第 2 期，頁 221-229。
- 衣若芬：〈睹畫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故宮學術季刊》第 33 卷 2 期，2015 年，頁 57-58。
- 吳政緯：〈從中朝關係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以《燕行錄》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1 期，2014 年 6 月，頁 209-242。
- 吳政緯：〈論朝鮮清心丸的流行與清代遼東社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62 期，2019 年 12 月，頁 49-96。
- 吳政緯：〈論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價值——以清書、清語與滿漢關係為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7 卷第 1 期（總第 33 期），2020 年 6 月，頁 55-105。
- 李夢圓：〈朝鮮文學家李德懋作品所表現的中國文人素質——以《入燕記》為例〉，《濱州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2 期，2014 年 4 月，頁 107-110。
- 李學堂：〈『열하일기(熱河日記)』 「호질(虎叱)」의 창작(創作)과 필담(筆談)의 의미(意味)〉，《漢文學報》第 19 輯，2008 年，頁 593-620。
- 李學堂：〈燕巖의 《熱河日記》筆談內容에 대한 일고찰〉，《亞洲文化研究》第 15 輯，2008 年，頁 147-184。
- 范金民：〈明後期江南生員群體形象——讀顧炎武〈生員論〉〉，《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1 期，2022 年 1 月，頁 104-114。
- 唐屹軒：〈《乾坤正氣集》與清中葉的纂修書籍風潮〉，《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52 期，2019 年 11 月，頁 59-102。
- 徐日東：〈朝鮮朝燕行使臣筆下清朝中國形象的嬗變及其內因〉，《東疆學刊》第

- 27 卷第 4 期，2010 年 10 月，頁 1-5+111。
- 徐日東：〈試論朝鮮燕行錄使臣眼中的滿族人形象〉，《東疆學刊》第 28 卷第 4 期，2011 年 10 月，頁 1-8+112。
- 徐毅：〈傾蓋如故，同氣相求——洪良浩與紀昀交遊攷述〉，《열상고전연구》第 31 輯，2010 年，頁 409-439。
- 康 燕：〈「文人燕記」《熱河日記》四種重要傳世漢文版本校勘研究〉，《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4 期，2021 年 8 月，頁 97-102。
- 張 輝：〈朝鮮朝漢語官話「質正」制度運行基本形態——「燕行」「筆談」與「質正」〉，《東疆學刊》第 37 卷第 1 期，2020 年 1 月，頁 82-88。
-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第 4 卷第 5 期（1967 年），頁 41-42。
- 張伯偉：〈東亞文人筆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人文中國學報》第 22 期，2016 年，頁 305-333。
- 張麗娜：〈論《熱河日記》中的中國文獻與朴趾源的學術立場〉，《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6 卷第 4 期，2013 年 8 月，頁 53-58。
- 許 放：〈國家圖書館藏《熱河日記》論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十七輯，2018 年，頁 265-281。
- 陳 明：〈筆談與明清東亞藥物知識的環流互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3 期，頁 81-95、181-182。
- 陳俐、徐毅：〈清代中朝文士筆談原因論略〉，《中國文學研究》2016 年 0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28-134。
- 陳葆真：〈從四幅「歲朝圖」的表現問題談到乾隆皇帝的親子關係〉，《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8 期，2010 年，頁 123-184+270。
- 楊雨蕾：〈韓國《熱河日記》研究綜述〉，《韓國研究》第 5 輯，2001 年，頁 139-151。
- 漆永祥：〈論「燕行錄」創作編纂過程與史料真偽諸問題〉，《歷史文獻研究》總第 43 輯，2019 年，頁 6-40。
- 趙慶，姚曉娟：〈《熱河日記》所見乾隆時期文學整體風貌〉，《文學評論》2020 年第 34 期，2020 年，頁 16-17。
- 劉 靜：〈從《燕行錄》看 18 世紀中國北方市集——兼論中朝文化交流與文化差異〉，《北京社會科學》2006 年第 3 期，頁 34-38。
- 潘建國：〈中朝文人筆談稿的形制及其流傳——以清劉大觀與朝鮮使者筆談稿手卷為例〉，《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0 卷第 3 期，2020 年 5 月，頁 147-159。

- 韓 東：〈論朴趾源《熱河日記》的創作技巧及其手抄本價值〉，《東疆學刊》第33卷第4期，2016年10月，頁31-37。
- 羅文華：〈清宮六品佛樓模式的形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總第90期），2000年，頁64-81。
-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地10卷第1期（總第19期），2013年6月，頁299-345。
- 〔日〕夫馬進著，張雯譯：〈朝鮮洪大容《乾淨衎會友錄》與清代文人〉，《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2012年，頁94-98。
- 〔日〕夫馬進著，張雯譯：〈朝鮮洪大容《乾淨衎會友錄》及其流變——兼及崇實大學校基督教博物館藏本介紹〉，《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2013年11月，頁90-103。
- 〔日〕夫馬進著，陳瑋芬譯：〈朝鮮奇書一關於洪大容《乾淨衎會友錄》、《乾淨筆譚》之若干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3卷第1期，2013年3月，頁117-126。
- 〔日〕金文京：〈十八、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在清朝的交流活動：介紹藤塚鄰博士遺品〉，《中正漢學研究》總第18期，2016年12月，頁81-96。
- 〔韓〕崔溶澈：〈中國通俗小說與十八世紀朝鮮的文體改革〉，《馬來西亞漢學刊》第3輯，2019年，頁49-60。

### （三）學位論文

- 朴青梅：《《燕行錄》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研究》，延吉：延邊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學位，2009年。
- 朴香蘭：《燕行錄所載筆談의 研究 洪大容·朴趾源 등을 중심으로-》，仁川：仁荷大學韓國學科古典文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 李旻靜：《朴趾源《熱河日記》的「筆談」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
- 李學堂：《『熱河日記』中の筆談에 관한 研究》，首爾：成均館大學漢文學科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
- 馬靖妮：《《熱河日記》中的中國形象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 崔 香：《《熱河日記》中的中國人形象之研究》，延吉：延邊大學亞非語言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 張麗娜：《《熱河日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 劉易穎：《尹會一、尹嘉銓父子著述禁毀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學系碩士論

文，2016 年。

#### (四) 電子資源

〔清〕《諸王傳 7》，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參見：  
<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瀏覽日期：2023 年 6 月 8 日。

〔清〕《后妃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檔案檢索系統」，參見：  
<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瀏覽日期：2024 年 3 月 10 日。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  
文獻資料庫」，參見：<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瀏覽日期：  
2023 年 7 月 13 日。

韓國古典翻譯院：《韓國古典綜合 DB》，網址：<https://db.itkc.or.kr/>，瀏覽日期：  
2023 年 7 月 13 日。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辭典》，參見：<https://encykorea.aks.ac.kr/>，  
瀏覽日期：2023 年 11 月 27 日。

韓國成均館大學 東亞學術院：《燕行錄 DB》，參見：<https://kcer.skku.edu/>，瀏覽  
日期：2024 年 3 月 10 日。